张呈忠关于宋代福利问题的研究综述里，对本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此后关于宋代士大夫与公益事业的个案以及综合研究中鲜有能够超越此文理论视野的成果”。虽然本文与“蔡京悖论”并无之间关系，但张呈忠的评价引起了笔者阅读本文的极大兴趣。

本文展现了作者刘子健出众的史学能力，刘子健不仅对史学研究的基本工具掌握娴熟，也有着独树一帜的思想创造。本文的前面大半部分的内容，作者主要进行的工作，是对南宋的士绅刘宰的生平进行考订。主要的史料来源，是刘宰的《漫塘文集》与《京口耆旧传》。通过对史料的收集、辨析，作者还原了刘宰的生平事迹，以及人生中所经历的大事件。其中比较重要的几项，如刘宰作为乡绅对地方的赈济、刘宰与士大夫之间的交游、刘宰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为读者揭开了观察南宋地方政府、南宋型乡绅的新类型（特别区别于隋唐与明清）。这一部分的内容多是对史料的整理，刘宰个人的生活事迹，似乎只是一个比较突出、但在历史的大年表上默默无名的地方精英的个人故事，无关乎宏旨，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则本文无非是一篇考证比较细致的历史论文，但就在本文的第九节，也是最后一节中，作者展现了其透过史料对历史现象的深刻洞见与想象力。

第九节的标题为“申论—南宋孺家的阶级性限制社团发展”，在别处，“申论”的含义无非是就前文的内容做一些简单的引申，但本文为“申论”提高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作者仅仅在只有一个研究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历史的看法，即南宋儒家的阶级性，重重限制了社团的发展，刘宰的事迹为突出的表现。读者可能会感到困惑，何以作者只凭借单独的案例再配合一些各方面的知识，便敢于下这样大胆的、概括性的结论？作者解释，“申论”不是“结论”，申论只是作者个人的见解，是一种基于已有现象的假设，是一种有待被证伪的猜想，在这一点上，作者认为他是在引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作者的方法无疑是富有争议，但也是极有创意的，实际上，“自然科学”的方法也要求有足够的样本，仅仅一个是显然不足的。但我们还是要感叹于作者做判断的勇气，以及从历史现象中总结原因的史学洞见。笔者尚未在其他地方见到本文的这种研究方法。

在没有看到进一步的研究、案例之前，本文的“申论”部分是否可靠，仍是悬而未决、有待检验的。除了研究方法令读者眼前一亮外，行文中的一处细节，笔者感到值得提出来。不少的后辈学者常常引用作者刘子健所提出的“宋代文化转向内在”的趋势，并在理解中有极端化的倾向。但本文中写道“南宋理学，沿袭儒家传统，也重视伦理经世等项，并不放弃外向的重点”，可以看到作者仍是看到了“外向”的一面的。